

郁達夫佚文集



方修·連奇合編

郁達夫佚文集

方修·連奇 合編

风云文史丛书之二

郁 达 夫 佚 文 集

编 者

方修 连奇

督	印	李拾荒
封	面	
题	字	陈建坡
封	面	
设	计	李福茂
出	版	风云出版社
		59, Jalan Hitam Manis,
		S'pore 1027.
印	刷	东艺印务公司
ISBN		9971 944 23 5

1984 年 6 月出版

S\$ 5.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移作本书插图，算是郁氏居星期间交游行止的一点遗迹。
后，黄葆芳先生寄来该图之照片，佐证所作判断无误。现在
绝句 推测第三句后三字应为「钟山蓼」。此文在报上发表
本书序文提及郁达夫题刘海粟等合作「岁寒三友图」的



目 录

序 方修	1
郁达夫佚文的发现 连奇	33
一九四〇年	
田中奏折与近卫国策	50
密锣紧鼓中之东西战局	54
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	58
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	62
倭阁新政体制和我们的反攻	65
华北捷讯与敌阉之孤注	70
欢迎美国新闻记者团	73
英美合作的反应	77
敌人敢发动新的攻势吗?	80
荷印·越南·以及中东	83
“九一八”九周年	86
欧局僵持下的越南	90
美苏接近和远东	94
越南降敌后国际的反应	98
欧战的持久和扩大	102
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	106
轴心国联盟与中国	109
美国、苏联与轴心国	113
缅甸与中国之交谊	117
欧战中心的转移	121
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	125

滇缅路恢复运输后的远东	128
一九四一年	
轴心国两面作战与马来亚	131
民主国家将在远东首先胜利	135
太平洋风云险恶中之“八一三”	138
远东情势变化的豫测	141
削弱侵略者的实力	144
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	147
欧战二周年与远东	150
敌美谈商与敌阁的危机	153
澳洲缅甸与中国的交谊	156
太平洋危机移到大西洋	159
十年教训——九一八的前夕	162
反侵略国际大会感言	166
敌寇会马上向苏联进攻么？	170
以德苏战局为中心	174
附录	
谈轰炸 郁达夫	178
关楚璞与郁达夫 吴继岳	181
俞颂华与潘公弼 吴继岳	184
缅怀郁达夫 姚楠	187
记《星洲日报》的几位总编辑 姚楠	192
郁达夫传（节录） 于盼	197

序

方修

(一)

连奇先生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去从事蒐寻和考订，终于编定了这册《郁达夫佚文集》，准备付印了。

这是在资料的搜集上有了大突破的一册郁达夫的遗作。

在本书编印以前，文艺界对于郁达夫晚年散落在南洋各地的遗作的搜集与出版，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三十多年期间，约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各有三几种出版物先后问世。由战后初期至七十年代以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的成绩是辑录了郁氏晚年的三两篇游记、少数杂文、以及一批旧诗。这些资料大都是得之于辑录者个人收藏的剪报或郁氏亲友热心的提供。由于份量不多，有关出版物不得不将这一部分资料和郁氏南来以前的一些作品合起来编纂；如温梓川的《郁达夫南游记》，郑子瑜的《郁达夫诗词集》等，都是这样的编法。有的甚至是避重就轻地以郁氏在中国的逸文为主，南游之作几乎尽付缺如。例如李冰人谢云声合编的《郁达夫集外集》，晚年的手迹就只找到一篇《乙酉年元旦遗嘱》；这还是郁的长公子郁天民由中国转寄来的。

这种辑佚拾遗的工作，由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晋入了第

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有关资料大都直接地、全面地从图书馆庋藏的一些旧报刊中抄录或影印出来，数量较之第一个阶段丰富得多，足以编成郁氏晚年创作专集，不需要用他南渡以前的作品来凑合成书。林徐典编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铃木正夫编的《郁达夫资料补篇（下）》，就是这一阶段的最有代表性的成绩。张笏编的《郁达夫选集》，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个系统。较后台湾出版的《郁达夫南洋随笔》和《郁达夫抗战文录》，则是把上述的温梓川、林徐典、铃木正夫、张笏等人编的四种不同版本拿来杂揉并凑，去其重复，重组一次而已，未有任何新的发现。至于近年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的《郁达夫诗词钞》，其中晚年所作部分，似乎也是个“百衲本”，不过没有象《郁达夫南洋随笔》等书的编者秦贤次那样周到，把资料的来源清楚地交代出来吧了。

现在，随着连奇先生编的这一册《郁达夫佚文集》的出版，郁氏晚年佚文的搜寻与印行，又再推进了一大步，升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册《佚文集》，和上一阶段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郁达夫资料补篇（下）》等书一样，都是对于郁达夫留给本地的文学遗产的大规模的发掘；但这次发掘的着眼点与前此不同，再也不是郁氏发表在星洲总汇各报副刊上面的杂文或诗词，而是另外的一片天地——他以代主笔的身份为星洲日报撰写的三数十篇社论。这些社论经连奇先生一番严格的考证，沙里淘金似的把它们和同一社论栏中许多其他作者的文章区别出来，尽管上面没有郁达夫的

署名，却可以确定百巴仙是郁氏的手笔。篇数方面，虽然较之《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少了一些，但每篇的篇幅比较长些，内容也较为充实些，因而更能见出郁的为文的功力；作为他的政论散文，那是更加有代表性的。

经过连奇先生这一次的深入搜寻，郁达夫在本地区的逸文，尚未发现的已经很有限了。据我们所知，篇数较多的是登在《星洲半月刊》上面的一批，约十余篇。今后如果有人以此为重心，继续做一些补遗的功夫，则这方面的资料，大概就趋于完璧了。

(二)

这批社论全属郁达夫的手笔是无可置疑的。且不要说编者连奇先生写了洋洋两万字的长序，从思想的脉络、理论的特点、以至惯用词语、特殊译名等多方面来论证它们与《郁达夫抗战论文集》等书所收的政论散文完全是同一个作者，即使没有连奇先生这一篇论析周详、雄辩无比的考证长文，所有经常阅读郁达夫的作品的朋友也都会从这些疏影横斜、摇曳多姿的文字中轻易地看出那确是郁的才子之笔。

据我所知，早在郁达夫替星洲日报撰写这一批社论的当时，本地的一般读者不但已辨认得出这些文章是出于郁达夫之手，而且有过不少有关的谈论。有人认为那是优美出色的政论散文，因而每篇必读；有人则认为它们有时写得“不通”，和郁氏在文坛上的鼎鼎大名未能相副。原来郁的这些在报馆里赶写出来的急就章，都是随意挥洒而得，未曾特别

润饰；所以经常有其不愧是名家手笔的精采非凡的段落，也不乏若干某些人所谓“不通”的所在——这大约是一些为了使到文气舒徐而加以拉长，以致结构稍为松散，看来似乎有点衍文赘词的句子；诸如：

“所谓和平谈判之名词，实系敌寇所造作，欲用以减轻敌国内民众之怨尤，而使敌阉得苟延残喘的用意”；

“所以在地中海上，即使有纳粹的飞机去助意大利作战，据笔者看来，恐怕所收到的效验，也决不会得到比它们轰炸英伦更有什么成就的”。

这类长句子，如果严格讲究起来，可能会有一半句真的不词，但绝大多数不仅文法上没有问题，而且显出一种意到笔随的自然之美，不丁不八，文如其人。郁的一般文字特色如句法长短参差，富有清新飘逸之气等等，有一部分就是由此构成的。喜爱郁的作品的人，正也同样欣赏他这种信手拈来、挥写自如的自然与潇洒。那些与词章的欣赏无甚缘份者，才会有兴趣去挑寻若干偶或有之的文法上的小毛病。其实，这批社论，在郁的政论散文中，已经是写得最整饬的一批了。好象“服一下务”“努一下力”、“抗一下战”这一类特有的构词法，在他的一些短文章中还较易见到，在这批社论里面就很少出现了。

我的这一段话，并不是在批评当时一些指摘郁的社论的人太不识货，而是想指出一项现象：当时的读者，对于郁的社论，不管是赞赏还是指摘，他们从同一社论栏的不同作者的文章中，都能清楚地看出那些篇是郁写的，那些篇则是“

论说但求严谨、行文唯恐越轨”（连奇先生语）的其他人所作，根本用不着谁来进行考证。这一点实在是很值得注意的。至少它说明了郁的这一批政论散文，确有其突出的独特风格，虽然没有署名，大家还是一目了然的。

因而我想，既然四十多年前的读者都已有了那么高度的识别能力，则现在的读书界，有了科学的考证文章的帮助，确认郁达夫的文字应该是毫无困难了。

问题不在于这一批社论是否真的是郁达夫的作品，问题是虽然这一批社论是如假包换的郁达夫的作品，它们在作为研究郁达夫的资料上的价值如何？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所有有了署名的郁达夫的遗文呢？

许多人知道，我们这些长期在报馆工作过的人更加清楚，报纸发表社论，评论时局，所代表的是报馆的立场，不是撰写人的观点；社论撰写人的观点，有和报馆的立场一致的，也有和报馆的立场不同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形，则社论或者也可以当作撰写人的言志之作来看。倘遇到后一种情形，撰写人就往往要牺牲个人的看法去迁就报馆的立场，结果社论写了出来，文笔虽然是撰写人的，内容却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意见、真实感情的表达，与个人的写作完全是两码事了。这样的写社论，有些撰写人自言是“替天行道”。

这种“替天行道”的现象，在二次大战后尤为普遍。所以尽管战后本地书籍出版业十分发达，好些人写了多年社论，却是一篇也不想辑存下来，视为自己的文章，代表自己的心声。他们拿出来问世的反而是一些其他性质的作品，如散文、

游记、翻译、学术著作等。

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郁达夫的这批遗文呢？

我的看法是，“替天行道”式的社论，在战后确是翕然成风的；但在战前，却还未曾成为主流，而且，至少有过两个时期，社论撰写人和报馆之间，在立场上可说无甚差异。第一个时期是本地报业发轫之初的书生论政时期。当时的报纸大都以社论来争取读者，保皇党与革命派各自斥资办报，各自派出他们的文胆来写社论搞宣传。由于社论撰写人都是各该党派的忠贞之士，与报馆有着共同的理想或目标，所以两者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矛盾。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这是整个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同仇敌忾、协力救亡，成了华人社会的主导思想；其他各种矛盾、冲突，都降低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因而一般社论撰写人和报馆之间，也不会有太多的歧见存在。

郁达夫为星洲日报撰写社论，正是处在这么一个时期。以当时的一般情况以及郁达夫个人的思想状态来看，我以为郁在写作上差不多是达到了自由发挥、畅所欲言的程度，只有少数极其个别的地方可能不是他真正的意向。譬如对于中国抗战阵营的阴暗面谈得很少、很含蓄，与约略同一期间胡愈之在南洋商报社论中大力抨击闽省苛政成了强烈的对照，显然的这是有点囿于当时星洲日报的立场的缘故。另一方面，郁对于一般党官应该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但提到的时候又是前一声“××长”、后一声“××座”地必恭必敬，这也是代表报馆写此类峨冠博带式文章照例礼不可废的结

果。这些都可以算是“替天行道”的部份，表现出来的并非作者的真实感情。不过诸如此类都是一些微枝末节，无关宏旨的。而且这种情况也见于副刊版上那些有郁达夫署名的政论短文，非独这一批社论为然。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一批社论的价值，和收入《郁达夫抗战论文集》、《郁达夫资料补篇（下）》等书的时评政论部份是完全相同，无分轩輊的。如果比起上述各书中的另一部份作品——那些形式更轻松些的漫谈文事、生活、漫谈个人遭遇、乡国之思的杂感随笔之类，则在显示作者的真性情这一点上，社论以至一般时评这一部份也许稍有不及，但相差也微乎其微。这两部份作品同样是研究郁达夫晚年思想文章的绝好资料。

（三）

郁达夫这一批佚文的蒐寻的缘因和经过，连奇先生在他的长序中已略为提过了。大家可以想见，这三几十篇因为没有正式署名而几乎永被埋没了的重要文献，确是得来非易的。此外，在整理这些稿件的过程中，也有些琐事可以谈谈，这里想补记一二。

稿件的整理初时进行得还算顺利，其中一部份已经送去排字。书名拟定为《郁达夫佚文三十篇》，（《佚文集》是较后才改的，）有个朋友还辗转托人请求茅盾先生写了一个书签。后来，由于连奇先生和我在生活上都遭遇到一些困扰，这方面的工作就只好放松下来。

譬如，有一段日子，一向不会演戏的我们，竟也不自量

力，合人家去搭起戏台，跑起龙套来。不久，善于演戏的人不再出台了，就轮到我们来收拾滕山残水。直到现在，每星期不时还要花费两三天去应付这类琐琐碎碎的事务。我是无业游民一个，闲工夫多少是有的；连奇先生要去打工，朝九晚五，除三扣四，就再也挤不出什么时间来继续处理这批书稿了。

这期间，郁达夫的公子郁飞也许听到一点关于这批稿件的消息，曾由中国杭州写给我一封信，探问究竟。我回信说已有友人K君在整理，将编成《郁达夫佚文集》，约七万字左右，现在是先搞一点考证，以免其中混入别人的作品，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最后一定会设法把它印出来，请放心，一旦出版，当即寄赠。

不久，郁飞先生又来了一信，说关楚朴离职以至俞颂华接任主笔期间，星洲日报的社论，似都是郁达夫一人写的。郁的文章也容易辨认；如果是无法证明，便只能以存疑的态度编成文集。又说，最好将书稿寄给他一看，或能帮助我们辨认若干云云。事实上，郁达夫的代写社论，并非独当一面，全部包办，而是同一期间有两三个人在轮流执笔，每人经常每周二篇，最多是三篇。至于辨认郁的作品，那的确是没有多大的困难，连奇先生和我都还可以应付，不需要怎样的存疑。问题是本书并非编给少数对于郁的文风有深刻认识的人看的，它主要是编给一般读者看的。一般读者又怎会轻易地同意你的空口说白话的“辨认”呢？我们宣称这些都是郁的佚文，至少也应该有一半篇文章来解释解释，提出一点

理由或根据来。上文所说的“搞点考证”，就包括着这一层写文章、提理由的小工程。其次，由旧报纸的显微胶片放大印出的稿照，好些字迹模糊不清，缮写时形成缺漏，校对时问题多多，需要去查对显微胶片才能解决。这就不但也要有点闲工夫，而且只能依靠本地图书馆的收藏和设备。郁飞先生远在杭州，是帮不了忙的。因而，我没有把书稿寄出，也没有再写回信。我想等待本书出版后，寄赠书时一并写信。

然而郁飞先生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一有机会就要为本书尽一点催生的作用。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星洲南洋联合早报的“商余”副刊，登了郁飞先生的一篇《新发现的两件手迹》，记述奥地利雕刻艺术家杜迪希战前旅居新加坡时和郁达夫的一段友谊，最后是谈到郁达夫遗作的编辑问题：

“……南天文字中，我想得起的，还缺少一九四〇年夏关楚朴先生离职到年底俞颂华履新为止的大约半年时间内，他为星洲日报写的社论，以及……《瞬息京华》的译文若干段。后一批只要有那份刊物就能复印，前一批虽不署名，但父亲的文字风格不难辨认，只要集有那个时期的星洲日报社论，就可确定其大部份，连同其余部份一并注明存疑编入集中。这在前人的集子里是不乏先例的。”这一段文字，从“中奥友谊佳话”转到作家遗著编例，一些读者也许不会觉得怎样，我和连奇先生却是明白其中别有深意。这主要是写给我们看的，等于再写一封信来敦促、催迫我们。意思差不多是说：“采用前人存疑的编例，快些出书吧，不必慢吞吞地搞什么考证了。”

一部份“确定”，一部份“存疑”，这编法当然是可行的。但郁飞先生可能未曾想到，即使如此，那“确定”的部份，也还是没有郁达夫的署名，无法直接证明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解释，告诉读者何以这些社论能“确定”是郁的遗作。这一来，还是免不了涉及搞考证、写文章这种有点损时失业的事。这种事对于时间充裕、研究工作与本身职业经常互相结合的某些大专教师来说是完全不成问题；但对于业务压力愈来愈紧、工余暇晷愈来愈少的一般工商机构从业员来说，却无论如何是急不来的。

同样的，有关稿照字迹多处模糊不清，需要补苴罅漏的问题，也不会因为文集采用了“部份存疑”的编法而获得解决。编者连奇先生还是需要一段时日去跑图书馆，去重翻显微胶片的。

撇开这些不谈，单就所谓“集有那个时期的星洲日报的社论”这一点而言，也不是像我们写文章时加上一两句“只要这样”、“只要那样”那么简单轻松的事。连奇先生在蒐寻本书的资料方面遇到的波折，在他的长序中已经披露了一些。日本的青年学人铃木正夫为了辑录《郁达夫资料补编（下）》里面的那些稿件，还特地在星加坡住了一两年。此中甘苦，这些过来人是最清楚的。其实，其他地方的人士也不乏相仿的经验。黄裳的《榆下说书》，有一篇《西泠访书记》，里面就谈及他到浙江图书馆要求看一下柳如是的《戊寅草》，费了好多口舌，结果还是徒劳往返。可见，搜集资料工作的並不轻松，在郁飞先生的故乡有时也是一样的。

就算一切都没有了麻烦，一批郁达夫的佚文已经蒐集完整，整理停当，可以出版了，那也並不等于立刻就能够付梓。这里还有一个接洽印行或者筹备印费的问题。郁达夫虽然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代文豪，但在许多出版商——特别是八十年代本地一般出版商的心目中，他的著作恐怕还不如一册《股票大王白手成家记》更值得投资呢！

我们很了解郁飞先生急于见到其先人的手泽问世的心情，我们希望把郁达夫的佚文早日整理出版的心意自信也不逊于任何人。但对于本书的编印，我倒没有建议连奇先生去特别赶工。原因除了上面说过的“急不来”之外，是前几年我和张笳合编的一册《郁达夫选集》，由于我自己的仓促从事，以致内容出现诸多纰漏，因而不想连奇先生去重蹈覆辙。

《郁达夫选集》的“诗词”部份，在编校上有两点始终使我深感不安的疏忽。其一是收入了那首“廿八年元旦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友人”，发排时没有留意，出书后始知这诗发表当时很引起李铁民的不满，指责郁达夫不应如此为汪精卫辩护，于是两人发生激烈的争论，后来郁发觉了确是自己的错误，曾矢言将来如有机会编印诗集，必定将这一首删去；而现在我们却将它辑录传世，这显然是大大违反了诗作者本人的遗志的。

其二是“题刘大师及徐君濂刘抗黄葆芳合作岁寒三友图图中有大石”这首绝句，第三句的最后三个字在旧报刊的显微胶片上不太清楚，我认为应该是“钟山蓼”，整首诗的内